

经济学名著译丛

劝说集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Essays in Persuasio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劝说集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蔡受百 译

Essays in Persuasion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劝说集/(英)凯恩斯著;蔡受百译.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经济学名著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11762 - 3

I. ①劝… II. ①凯… ②蔡… III. ①凯恩斯
主义 IV. ①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503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经济学名著译丛

劝 说 集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蔡受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762 - 3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原序	1
----------	---

第一部分 凡尔赛和约

第一篇 巴黎(1919 年)	7
第二篇 德国的赔偿能力(1919 年)	12
第三篇 关于欧洲复兴方面的建议(1919 年)	21
一、关于和约修正问题	21
二、协约国间债务的清算	29
三、国际贷款	37
第四篇 舆论的转变(1921 年)	42
第五篇 战债与美国	47
一、战债取消问题(1921 年)	47
二、贝尔福备忘录(1925 年)	56
三、再谈战债取消问题(1928 年)	59

第二部分 通货膨胀与通货收缩

第一篇 通货膨胀(1919 年)	69
第二篇 币值变动对社会的影响(1923 年)	71

甲、币值变动对分配的影响	73
(一)投资者	73
(二)企业家	81
(三)工资劳动者	84
乙、币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	86
第三篇 法国法郎	91
一、给法国财政部长(不管他是谁、或可能是谁)的一封公开信(1926年1月)	91
二、法郎的稳定(1928年)	98
第四篇 关于扩张计划(1929年5月,普选日)	102
第五篇 1930年的严重萧条(1930年)	116
第六篇 关于节约(1931年)	126
一、节约与花费(1931年1月)	126
二、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31年8月15日)	133
三、节约方案(1931年9月19日)	138
第七篇 币值崩溃对银行的影响(1931年8月)	142

第三部分 回到金本位

第一篇 黄金热(1930年9月)	153
第二篇 货币政策的几个不同的目标(1923年)	157
一、货币贬值与通货收缩	158
二、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	164
三、恢复金本位制问题	168
第三篇 关于将来如何调节货币的正面建议(1923年)	179

第四篇 银行行长们的发言(1924—1927 年)	184
一、1924 年 2 月	184
二、1925 年 2 月	188
三、1927 年 2 月	196
第五篇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 年)	202
一、丘吉尔先生的误解	202
二、贸易均衡与英格兰银行	209
三、有没有补救办法?	216
第六篇 通过关税政策来求得事态的缓和	223
一、建议实行财政关税(1931 年 3 月 7 日)	223
二、在取消金本位制前夕(1931 年 9 月 10 日)	230
三、取消金本位制以后(1931 年 9 月 28 日给《泰晤士报》 的一封信)	234
第七篇 金本位制的结束(1931 年 9 月 27 日)	236

第四部分 政治

第一篇 对俄国的简略观察(1925 年)	245
一、共产主义信仰是什么?	245
二、共产主义的生命力	252
第二篇 放任主义的终局(1926 年)	258
第三篇 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员?(1925 年)	266
第四篇 自由主义与工党(1926 年)	279

第五部分 前途展望

第一篇 《克力索尔德》读后感(1927年)	287
第二篇 经济前途展望(1930年)	295
译名对照表	309

原序

这里收集的是言不见听的一个预言者十二年来的呼吁；十二年来，他唠唠叨叨说了许多，但对事态的进程，丝毫也没有能发生影响。这个集子也许可以题名“预言与劝说集”，因为不幸的是，比较有成就的还是预言，而不是劝说。但是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精神大都是在于劝说，是想由此对舆论有所影响。文章发表以后，其中有很多部分，当初被看作是出言轻率，措辞偏激的。但是我想，读者今天把它们从头再看一遍，将感到，这是由于它们跟当时占压倒势力的感情和意见往往背道而驰的缘故，而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当时认为这些文章的内容，有的未免过于偏激了，但我的感觉正相反——虽然，作为一个证人，我是总不免有偏见的——我把它们重阅一过，根据事后的演变来判断，觉得说得过分的地方比较少，还是说得不够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会这样，是在写作时环境下的自然结果。这些文章中有好多篇，当写的时候就痛楚地意识到，势必有许多自告奋勇者会群起攻击，而支持我的人却很少，因此须费尽心力，对于当时无法证实的那些，尽量避而不谈。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一直在警惕着，就我的信心与论据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在语调上必须力求温和。

这些文章，根据内容，自然地分成了五个部分，上面所说的，主

要适应于前三个而不是后两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所体现的是，近十年来我们这里发生的论战中的三大主题——和平条约与战债、通货收缩政策和恢复金本位制。^①

我毫无保留地投入了这一论战。实际上这三个主题在某些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后两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这些文章都是在匆促中写成的，作者在不顾一切的迫切心情下，想对他的读者及时进行说服。但是后两个部分，由于在时间关系上比较疏远些；因此听到的噪音比较少些。在这里，作者眼光所注的是较远的将来，对问题作了反复深思，这些问题都是要经过长期演变，才能确定是非的。他可以比较冷静地、从容地来考虑这些问题。这里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实际上是他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一个中心论点，一种深刻的信心，认为我们所混称的经济问题，也就是欲望与贫困的问题，是各个阶级与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它所体现的不外是一种可惊的混乱，是暂时存在的、多余的混乱。因为西方世界，在物资方面，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条件；如果能够创造出利用这些条件的体制，就可以把现在消耗着我们精力与物力的经济问题，制抑到次要地位。

因此写这些文章的作者，在他的呼声中，仍然怀有希望和信心，认为为期已经不远，当那个时期到来的时候，经济问题将退处

^① 1923年，在我们恢复金本位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货币调节的正面建议”，现转载在这里，作为本书第三部分的第三篇。现在我仍然坚信这篇文章里提出的主张。如果我们实行了金本位制，这些建议当然会被暂时搁置下来。但是如果有人要晓得，作者对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通货问题的解决，大体上抱怎样的看法，则可从这篇文章里获悉。

于它原来所处的卑微地位，我们的心力将用来，或重新用来，对付我们的真正问题——生活问题，人类关系问题，属于创造、行为与宗教上的问题。碰巧的是，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分析中得出一个微妙的推论，说明为什么信心在这里会发生有效作用。如果我们始终不懈地在乐观的假设下前进，假设就不难转化为事实；否则如果在悲观的假设下采取行动，那我们就将永远陷入困乏的沼泽中，无法自拔。

这些文章是从作者已经发表的作品中采集得来的。这些作品有的原载在整本的书里，有的是独立的小册子，有的发表在报纸或期刊上；采集时兼收并蓄，不加区别。汇编时对于原文的任何部分，凡是对文章的主要论点看来是多余的或不必要的，或者由于时过境迁，现在已经失去兴趣的，即毫不吝啬地加以删削（删削处本书内概未注明）；但对于保留的部分，则内容一点也没有改动。事后添上的说明性质的脚注，概用方括号括上。当进行删节时，作者曾竭力注意，避免因此影响到语气的轻重，避免因此看上去与原文会有任何差别。但是为了满足好奇的、喜欢寻根究柢的那些人的需要——如果当真有那样的人的话——在本书末页附了一张表，注明各篇文章的出处，在那里可以找到完整的原文。

我拣了这一个日子让它出版，认为是合宜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事机转变的时刻。人们把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所遭遇的叫作国家危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英国最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正处于暂时的小休状态。现在是 1931 年秋季，我们瞻前顾后，看到两面都是悬崖飞瀑，我们正小憩在其间的一个静静的池边。主要的一点是，现在我们又夺得了选择的自由。在英国今天简直已没有

人相信凡尔赛和约，或战前的金本位制，或通货收缩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战斗已经获得胜利；这主要是出于事势变化的无可抵抗的压力，至于固有偏见的逐渐克服，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但是我们下一步应当怎样进行，对于我们重新夺得的选择自由应当怎样利用，大多数人所有的，还只是一个模糊概念。对将来要能作出聪明的选择，就得牢牢地抱住过去。因此我愿意向读者提醒一下，我们是怎样过来的，目前的现象怎样，过去犯了些什么样的错误。

J. M. 凯恩斯

1931年11月8日

第一部分

凡尔赛和约

第一篇 巴黎(1919年)

人类是善于与环境相习惯、相契合的，这种能力是人类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拿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欧的经济结构来说，在性质上是那样地错综复杂，摇晃不定，情形是显得那样地难以信赖，不同寻常，但很少人能真正觉察到这一点，一般对于这类现象都安之如素。我们近来获得的某些优势和利益，实际上是极端特殊化，极端不可靠的；但我们却把它看成是恒久性的，是理所当然的，即以此为依据，来安排我们的计划。于是我们就在这种虚假和脆弱的基础上，讲求社会改革、讨论政治方针，进而发展我们的敌忾心情和某些野心策略；我们就这样满怀信心地摸索前进，实际上对于这个欧洲大家庭里的内部冲突，是在推波助澜，而不是在使它缓和。一方面德国人则在狂妄幻想和不顾前后的自私心理的驱策下，推翻了这个我们据以生活和进行建设的基础。上述的经济结构，相当细致、微妙，只有欧洲人民能够使用，能够在这个结构下生存；但这种结构，经过战争，已经有了动摇，已经受到损害。开始这一破坏行动的是德国人；法国和英国一些代言人，通过和约，本来是可以有希望把这个摇摇欲坠的结构重新建立起来的；而事实上他们的活动却很有可能使破坏达到彻底、全面的地步；因为这样的和约如果付诸实施，对结构的损害将越来越大。

在英国,就生活的外貌来说,还没有能教导我们,使我们感到或至少认识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战争使我们的生活有了一次波折;在战事结束以后,我们忙着重寻旧梦,要把一度中断的生活方式重新继续下去,这时有很多人看到,现在与过去对比下唯一的差别是,较前富裕了许多。在战前我们是成百万地花费着,现在我们却不妨成千万、成万万地花费,看来并不会因此发生危害。在经济生活方面,显然没有充分发掘我们的潜力。当和平恢复以后,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所想望的,不仅是重新回到1914年水平,而是变本加厉,想按照原有规模大大扩充。各个阶级都有着类似的打算;有钱的人想的是,多花费些,少储蓄些,穷苦的人想的是,少做些工作,多用些钱财。

但是,看来只有在英国(和美国)能够这样麻木不仁。在欧洲大陆感到的是,整个世界在痛苦呻吟中,没有一个人不听到这种悲惨的呼声。在那里发生的,不单是生活浪费或“劳资纠纷”问题,而是关系到生死存亡、饥饿挣扎,关系到在奄奄一息中文化可怕的剧烈变化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停战以后的半年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然后偶然来看一看伦敦,就会感到无限惊讶。英国对欧洲仍然置身事外。在欧洲那种深刻的恐怖和战栗,并没有传播到英国;对英国说来,欧洲是另一个世界,跟它并不是骨肉相联的。但就欧洲自身说来,却是一个整体。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俄国、罗马尼亚和波兰,它们彼此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在结构方面,文化方面,根本是统一的。它们共安乐,也可能共患难,在这次战争中则共同赌博着自己的命运;而我们在战争中虽然作出了巨大

牺牲和贡献(同美国相类,虽然在程度上要差些),但在经济上则处于旁观地位。巴黎和约富有灾害性的意义,就在这一点上。现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已经一蹶不振;法国和意大利尽可以凭着一时的战胜余威,为所欲为;但是它们和不幸的战败国家之间,在精神上,经济上,存在着难解难分的密切关系,它们如果在停战后滥用威权,对战败者企图尽力破坏,置之死地,结果将自取其祸。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英国人,在参加了巴黎会议以后,并且在这几个月以来,作为协约国最高经济会议的一个成员时,对他说来是一次新的经验,结果就必然会使他在心情上,在观念上,成为一个欧洲人。那个所在是欧洲体系的神经中枢,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固有的一些成见,必然会大部分化除,必然会跟别的、更加可怕的幽灵纠缠在一起。在巴黎的经历是一场噩梦,个个人在那里都会吓得神志失宁的。满眼看到的,满耳听到的,是在琐屑、凡陋的场面下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是人们面临着重大任务时,那种无能和渺小的表现,是当作出决策时、与严重意味交织在一起的那种不真实感,是种种的轻率、愚昧、狂妄以及从外面来的那些惊惶失措、迷惑、混乱的呼声——一切古代哀情戏曲的气氛在那里都占全了。我们置身于讨论政务的法国沙龙,看到威尔逊和克雷孟梭那种不同流俗的仪表,那种坚定的态度和不变的个性,就不免要作这样的痴想,这些究竟是不是骨肉构成的颜面,还是某些传奇表演里或傀儡戏里在悲剧或喜剧表情下的面具。

在巴黎的一切动作,都同时具有这种异乎寻常的、既觉得重要又觉得不重要的情态。作出的决定,对人类社会前途似乎会发生重大后果;然而又隐然有着这样的感觉,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实在的

力量，都是白费的，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没有效果的，不切实际的。这时会使人们感到极深刻印象的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或哈代在《主权者》^①里所描写的那种景象——事势的进展自会达到命运注定的结果，却与会议中政治家们的擘划经营，没有关系，进展趋势并不会由此受到影响。下面一段是道出了这一景象的真情的：

岁月之神

看吧，那愚昧的芸芸众生，
他们丧失了一切远见和自制，
被本性的轻率鲁莽驱入了魔窟之门。
剩下来没有别的，
在强有力者只是复仇心炽，
在软弱无能者只是空怀着一腔怒火如焚。

慈悲之神

为什么人类的意志，
会导成这样昏瞽的行动和心情？

岁月之神

我跟你说过这是在不知不觉中演进的，

① 以拿破仑战争为主题的戏曲。——译注